

高等院校民族学人类学教材

民族学与人类学 方法论研究

MINZUXUE YU RENLEIXUE
FANGFALUN YANJIU

[意] 马力罗 (Roberto Malighetti) ◎著

吴孝刚◎译

非
外
借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高等院校民族学人类学教材

民族学与人类学 方法论研究

MINZUXUE YU RENLEIXUE
FANGFALUN YANJIU

[意] 马力罗 (Roberto Malighetti) 著

吴孝刚 译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学与人类学方法论研究/(意)马力罗 (Roberto Malighetti) 著;
吴孝刚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130 - 5614 - 4

I. ①民… II. ①马… ②吴… III. ①本土方法论②人类学—方法论
IV. ①C91②Q98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0054 号

内容提要

本书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启发人们对民族学人类学乃至整个科学概念进行反思,兼具历史和哲理深度。这种独特视角在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界是少见的,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研究空白。本书译者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翻译能力和人类学功底,足以准确、流畅地把作者的观点介绍给中国读者。

责任编辑:纪萍萍 石红华

责任印制:孙婷婷

封面设计:张 冀

民族学与人类学方法论研究

[意] 马力罗 (Roberto Malighetti) 著

吴孝刚 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50号院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30	责编邮箱: shihonghua@sina.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70千字	定 价: 48.00元

ISBN 978-7-5130-5614-4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著名人类学教授马力罗 (Roberto Malighetti) 先生与我相识多年,他曾在我们学校讲授多门人类学课程,包括医学人类学、人类学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等,深受学生欢迎。我也多次听他的专题演讲,很佩服他学识的渊博和见解的独到。特别是他对中西人类学界的差别进行分析时所展现出的历史深度和哲理视角给我很多启发。几千年来,中国与欧洲一直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和思想体系,加上冷战时期的隔膜,至今双方学者之间还是存在很多互不了解甚至误解之处。与马力罗教授接触,我发现他的思想与中国人多有相通之处。这一方面应与他喜爱中国文化有关。甚至在年近 60 岁时,他还专门下功夫学习中文,几年下来,现在已能用中文给我写信。另一方面,这还与他常从哲学角度去思考人类学的习惯有关。中国文化是讲究哲理、喜欢刨根究底的文化,因此他的观点比较容易被中国读者认同。

他请我为其著作《民族学与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的中文版写个序,我贸然答应下来。但当我粗略翻阅了吴孝刚博士的译稿之后,发现虽然讲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和学派,但他在分析时却涉及大量西方哲学和科学史内容,非一般读者轻易能理解。在拜读过程中,我也深感自己对有关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的西方文化背景了解太少。

拜读了马力罗先生的书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方法论”是什么的问题。思忖多日,感觉这个中文词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方法论涉及的内容太多,用这样一个词汇很难让人理解其丰富的涵义。

方法论和方法,是人类学民族学课程中经常会涉及的问题。有人说,



科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导性方法，二是技术性方法。方法论指的是指导性方法，而方法就是指具体的技术性方法。技术性方法比较容易界定，每个学科都有自己比较独特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学是文献法，民族学是实地调查法（访谈、观察、问卷、统计）等。各学科也有通用的方法，如比较法、归纳法、演绎法等。但方法论是指什么、主要包括什么内容、方法论与方法有什么关联与区别，各种教科书中却往往各说各话，让人难得要领。

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方法论，可能有一点启发。该校训说：“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不在于他的经验，而在于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成功与否，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经验性、技术性方法，而是能够长期指导他行为的思维方式。纵观历史，我们感到这句话确实是有道理的。世界上多少千年文明古国最后却败在那些新兴民族的手下，他们的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但他们停步不前的思维方式却导致了其技术性方法的逐渐落伍，最终导致整体的失败甚至灭亡。

有人说，方法论是指宏观角度的、世界观角度的站位。也有人说，方法论是指立场和观点。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分析问题时的辩证法。这个说法虽然比较完整，但也太过简单。其实，方法论也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层次的。所以所谓方法论，应该包括我们的哲学思想，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目标，我们做事时的各种理论的导向。一句话，方法论即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主要是指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各种规律的认识。方法论是指导技术性方法的思维，是指导我们在研究中需要采用、选择什么方法、什么路径的思维。人类社会的进步，首先得益于人类思维的不断进步。

欧洲的中世纪曾是神学思维统治一切的时代。我们认为那是个黑暗的时代。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人文主义使得人类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于是，到了18世纪，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各学科成为统治性思维，并在全球范围所向披靡、高歌猛进。受其影响，人文主义逐渐被科学主义取代。此后，自然科学对人类的认识论和人

类思维的影响如此之巨，以至马克思都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 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也都进入科学主义方法论的时代。

在科学主义指导下，各个学科的学者们都毫不怀疑客观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相信有绝对的客观真理的存在，因此主张实证主义、整体主义、唯识论、理性主义，主张主客的划分，认为认知的主体是单向地了解其研究对象，从而主张客观中立。以这些理念为基础，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则发展出了进化学派、功能论、结构主义等学派或各种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方法论。

“二战”以后，世界的发展又促使部分人对以往那种主客分离的所谓科学理论产生了怀疑，认为过去的那些科学理论并不能包容和解释千变万化的世界，特别是不能解释人类自己的思维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于是出现了精神科学方法论的解释学。更有人主张后现代的一些立场去看待事物，于是民族学人类学界也出现了各种后现代的理论。

人类的认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进步的，谁停步不前，结局只有落后与失败。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需要方法论的不断探索与进步。我们又该如何去判断各种方法论的长短优劣，从而选择更适合的研究方法呢？这首先需要了解各学科不同的方法论的发展背景，了解方法论在不同时代与方法的关系。

马力罗先生此书，就是将民族学人类学在不同时代流行的和不同学派坚持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放到方法论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讨论和分析，让读者对其发展脉络有一个深入的理解。

过去在我们的民族学人类学课堂上较少进行方法论的介绍，在我们的研究中也比较忽视方法论的讨论，特别是少有探讨方法论的著作。马力罗先生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它虽然不是能够轻松读懂的著作，但如果认真拜读，一定会大有收获。

杨圣敏

2018 年元月于北京

译者序

我与马力罗教授的结识是在2014年，当时我正在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就读博士二年级，马力罗教授作为访问学者为研究生开设人类学课程。我选修了其中的一门，叫“Fieldwork and Methodology”（实地调查与方法论）。哲学与人类学的融贯，是该课程最大的特点，教授在课堂上展现出的专业素养和思辨能力让人折服。教授具有哲学背景，熟稔西方哲学，他能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讲述复杂艰涩的哲学知识，其化繁为简的功力令人惊叹。从哲学角度思考人类学问题，让我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更为透彻，对人类学的理解更加深刻。在教授的启发下，同学们在课堂上的表现都很积极，然而语言不畅还是对教学效果有所影响。教授和我都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我们商量，决定将讲义译成中文，以便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课堂内容。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讲义的译本。马力罗教授在书中延续了他在课堂上的思辨风格，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百余年来的人类学进行反思。马力罗教授认为，西方现代哲学的认识论基础是主客分离原则，它主张知识是对客观或外在世界的中立性呈现，否定知识的人为性或建构性，结果是用客观性来抹杀主体性。这充分体现在以笛卡尔、培根、伽利略和牛顿的认识论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中。而自诞生之日起便以自然科学为模板的人类学，也同样落入主客分离的窠臼。它以实地调查为基石，却将调查过程排斥在分析之外；它笃信田野资料能忠实地反映客观，而无视调查者的主体性对观察和描述的干扰。在马力罗教授看来，这些都是有损真知的鄙陋之见。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能排除人的主体性，主体



与客体、理论与事实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提出要用主客互动来超越主客对立，来解放往日受到重重压制的主体性，来恢复知识和科学的真实面目。马力罗教授在书中的批判触及人类学和现代科学的认识论根基，启发我们对传统人类学及现代科学概念进行反思。

教授的著作逻辑严密，行文一气呵成。然而翻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这本书的主题属于我的专业，但其中有很多我感觉生疏的跨学科词汇，我只能一边查资料，一边向教授请教。实际上，翻译是在不断的讨论和商议中进行的。虽然我平时经常阅读英文著作，但阅读和翻译毕竟是两码事。如何在保持学术性的前提下用中文贴切并流畅地传达作者的思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它考验的不是译者的英文能力，而是他的中文水平和专业水平。英文不济倒可以原谅，如果一个博士被人批评说中文差、专业差，面子上总是有点过不去，我的提心吊胆多出于此。

我一直觉得译者所负的责任要比作者大得多。作者只需要对读者负责，而译者却同时要对读者和作者负责。坏书当然译不好，好书被译坏的例子却比比皆是，这给我很大的警示。我曾为一个单词苦思冥想几个小时，为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表达而忧愁烦闷好几天，我在每一个词句上都小心翼翼，就是怕自己的胡译乱译使读者受蔽、使作者蒙羞。尽管如此，书中肯定还有许多不当或错误之处，我作为责任人，已做好接受批评的准备。

吴孝刚

于中央党校红楼公寓

2017年12月22日

致 谢

本书的成形应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的师生，尤其是杨圣敏教授的支持。我感佩于杨教授的学养和人品，更感谢他为拙作作序。特别感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前院长丁宏教授和现任院长麻国庆教授，他们不仅支持我的教学工作，在学术上也给我启发和建议。

本书是与民大一系列合作的延续。这些合作包括：发表关于中国人类学和方法论问题的论文（Malighetti, 2014; Malighetti, Yang, 2016），在米兰-比可卡大学召开意大利首届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会议，意大利“人类学中国研究会”首任会长就职，等等。杨圣敏教授和丁宏教授参加了这些活动，并且提出了各自关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真知灼见。

与民大学生在课堂和研讨会上关于人类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也让我获益良多。若无他们的参与，这项工作是万万无法完成的。尤其要感谢吴孝刚博士的辛勤付出，他担下翻译的重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地就书的内容进行探讨。在杨圣敏教授门下就读期间，吴博士对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展示出极强的理解力，这让我们之间有了碰撞式的互动，使我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独具魅力的人类学语言和哲学语言。

谨将此书献给民大师生。书中有益的内容，应主要归功于他们；而任何缺陷或错误，由我一人负责。

马力罗

2018年1月10日

目 录

导论 科学的多元统一：一个永不知足的学科在认识论上的贡献	1
第一章 问卷与统计	10
第一节 沉默的伎俩	10
第二节 民族志与人类学	13
第三节 询问与记录	15
第四节 统计与比较法	20
附 录 《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节选	23
第二章 实地调查：最初的尝试	31
第一节 实地观察	31
第二节 先驱：“人类观察者学会”	32
第三节 内部研究法与北美民族志	34
第四节 实地调查：精细化研究和谱系法	40
附 录 威廉姆斯·里弗斯《论收集社会信息和婚姻家庭信息的 谱系法》	45
第三章 参与观察	54
第一节 方法革命	54
第二节 民族志实践与功能论	57
第三节 参与观察与专著	61
第四节 “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63



第五节 马林诺夫斯基的遗产	68
附录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导论： “主题、方法与研究范围”	73
第四章 田野中意义的协商	90
第一节 阐释学转向	90
第二节 深描	92
第三节 从人类学家的视角	95
第四节 反思	99
第五节 民族志的撰写	101
第六节 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	103
附录 格尔茨《文化的阐释》第一章：“深描：迈向文化阐释论” ...	106
第五章 身本人类学	129
第一节 民族志的新角度	129
第二节 作为民族志调查工具的身体	132
第三节 身体化与注意力的身体形式	134
第四节 用身体学习技能	136
第五节 从身体到文本：权威、权威化与作者	139
附录 托马斯·卡索达斯《作为人类学范式的身体化》	143
参考文献	152

导论 科学的多元统一：一个 永不知足的学科在认识论上的贡献

出于“永不知足的原则”（Foucault, 1971, p. 371），与其他社会或人文科学相比，人类学对哲学和科学观念的变化、对文化间关系的改变（从去殖民化到全球化）更加敏感。它重新思考自身的科学基础，在知识的科学性以及各类科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Malighetti, Molinari, 2016）

受阐释学转向的影响（Geertz, 1973），当代各种新兴理论将人类学从17世纪陈腐的科学观念中解放出来，使之摆脱了对现代科学的一味模仿。现代科学在天文学和物理学提供的经验主义和理性知识的孕育下成长，其认识论原则源自培根的归纳法以及伽利略对观察、实验和数学的综合应用；而后，笛卡尔哲学把它系统地形而上学化——其基础是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认为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最后，以实验和描述为特征的牛顿经典力学将它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依海德格尔所言（Heidegger, 1938），现代科学概念立足于双重客观化过程：一方面，它呈现出一个由“真实”“外在”的客体所构成的世界，受物理因果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被分离出来，被认为具有极度理性，这个抽象的、非人格化的“我”凭其先验性特征而成为“自然的立法者”（legislator of nature）。培根对个人和群体性谬见的批判、笛卡尔的怀疑论、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和康德批判，塑造了一种缺乏时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抽象知识观，它将科学知识理解为一面“自然之镜”（Rorty, 1980），是对客观世界全方位的呈现，而知识自身的产生条件



及社会文化根源却被忽略了（如同眼睛看不见它自己一样）。

为应对再现（representation）危机，为将政治伦理反思同认识论和实地调查相结合，人类学重新审视一直被奉为圭臬的现代科学观：唯一、确定的科学方法，理论与数据、观察的严格分离，无涉主观的、完美的形式化语言，对“真实”的追求。它批判的是现代科学关于方法的中立性假设。一端是等待认知的客体，即数据；另一端是认知主体，基本上被去主体化——科学方法的普适性和可复制性就建立在这种双重外化的基础上。主体一旦被方法排除，社会事实就成为真实存在的客体，可以被直接观察，可以用科学语言来指代和转录。观察本身是中立行为，不影响客体的意义，与理论无关。最早将数学方法引入人类学的，是泰勒用于比较研究的统计相关和相从变动（Tylor, 1889, p. 253）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的“具体证据统计记录法”（Malinowski, 1922, p. 13）。二者都排除了人类学情境中的主观因素，人类学研究成为关于命名和分类的定量分析。科学被认为是一种规律性知识，从归纳比较中获取结果，它依赖于规范的形式化语言。在这种认识论框架下，民族志实践只是无需思考的描述性、再现性活动，其价值仅在于为之后的理论分析提供经验材料。

马林诺夫斯基日记（Malinowski, 1967）表明，民族志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同时也存在认识论问题。日记揭示了将主体客观化的人为操作：一面针对被认知的事物（个人、社会、文化），一面针对认知行为者（从经验中抽离、只具备逻辑功能的纯粹自我）。它显示出与现代性共生的根深蒂固的方法论问题，证实了主体与客体、纯粹自我与经验之我以及中立与融入之间的摇摆不定。日记在实践上无视现代科学决不妥协的主客体分离原则，而那种将经验与客观相结合、通过了实证主义检验的参与观察法，则被证明是建立在错误认识论基础上的悖论。（Paul, 1953；Duranti, 1997）总之，马林诺夫斯基日记提示我们，主体缺位是方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

阐释人类学敦促我们去解决主体、方法及客体之间的不兼容，它在被其他学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上发问。民族志学者的身心融入、不可重复的偶然迷失以及对当地人生活的参与，这些都要求我们去重新思考主体

性、认识论、方法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们并非那么简单明了。关于人类学知识的生产问题，格尔茨启发人们做出认识论的分析。对此，我们一方面可以运用各类社会人文科学的知识，如理解社会学、阐释学、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等，另一方面可以汲取当代科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从粒子物理学到神经生理学，从统计力学到湍流数学，从遗传学到微生物学、胚胎学、免疫学和神经生理学，从复杂性科学到计算机科学，等等。

当代科学向人们呈现了一个由无固定位置的非绝对物体所构成的不确定的复杂世界，它不同于欧几里德意义上的延展性实体（空间可度量、速度和位置确定无疑）。不独软科学的研究对象，硬科学的研究对象如亚原子粒子（质子、中子、电子、夸克）也都不能被看作单独个体，它们不是牛顿意义上的简单物体，不受因果律的支配，也无法用清楚明确的力学范畴（质量、力、运动）来考量。人们无法通过观察和再现这种中立性方法来认识亚原子粒子，无论实验条件有多理想，它们都无法被感官直接或间接地感觉到。量子力学显示，研究对象与测量工具的相互作用发生在每一次测量中，测量值永远是不确定的，位置与速度不能被同时测量，实验也不能不考虑观察条件。如海森堡所言：“我们所观察的并非自然本身，而是暴露在我们调查方法下的自然。”（Heisenberg, 1959, p. 73）

由此观之，客体的性质不可避免地为认知主体所改变，而在主体产生改变作用之前，客体是不存在的，它在与测量工具的临时性互动中被建构。没有射线改变系统的状况，亚原子粒子则无法被观察到。科学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人造物，是正式地经过人工塑型的产品，是“法则性物体”，即因某种法则而成为物体（Bachelard, 1940）。那些被经典科学视作永恒不变的事物，在今天看来却是变化不定的。基本粒子发生着碰撞、转化和分解，还有一些奇怪现象：类星体、脉冲星、宇宙大爆炸、银河系断裂、吞噬一切的黑洞以及其中的星体崩塌，等等。观察者的相对论意识已取代了牛顿物理学，他不只生活在物理世界，也生活在社会文化世界。（Prigogine, Stengers, 1977）

这些都对实证主义和新经验主义一元论发起了冲击，它不认为科学的



客观性在于对“已在”的再现，那种用实证主义统一所有科学的企图受到巨大挑战（在那里，“自然科学”一词不过是同义重复）。它还反对新实证主义用超语言和规律来统一各种科学的尝试，即在经验观察之上运用数理逻辑。（Neurath, 1932; Carnap, 1935; Hempel, 1965）此外，它也不支持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严格对立，这种对立源自德国历史主义中的反实证主义观念：卓伊森先提出“解释”与“理解”的二分（Droysen, 1868），狄尔泰指出主体与客体“心灵”关系的不同模式（本体的统一/分裂）（Dilthey, 1883），而后温德班提出特殊性科学与规律性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Windelband, 1894）。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都无法解决不同知识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反实证主义导致特殊与普遍、个别与类别、经验与规律、解释与理解之间严格而僵化的对立；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仍受困于语法与语义的截然二分，造成了两种不同形式的事实：观察性事实和分析性事实，前者是缺乏形式的纯粹内容，后者是与经验无关的空洞形式。新实证主义无法将理论与经验联系起来，无法分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形式在内容生产上的作用，或者更一般地说，它无法分析将事实呈现出来的实际状况。（Borutti, 1996）

对此，当代人类学因重视研究者的主体性及其形塑现实的能力，而得以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当代人类学延续了韦伯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重建。韦伯采用新康德主义视角，将方法论问题转化为客体的建构问题，同时努力调和科学的规律性与理解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也就是理性解释对事件的转化和理想化）并不是建立在事实之上，而是建立在科学话语内部概念之间的联系上。科学要研究的不应是自然本身，而是它对历史文化主体的意义。知识之所以是客观的，并不是因它提供了关于事实的标准，而是因为它产生了可以在理性和意义关联中进行思考的条件。韦伯的理想型是建构事件的程序，它是一种系统化过程，而不是抽象的经验概括和规律总结。（Borutti, 1988）

如此一来，我们就有可能超越解释与理解、独特性与规律性、忽视特殊性的一般性逻辑与不可化约的特殊性逻辑之间的二元对立。各种科学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关于不同研究对象的知识之间的关系（自然、社会），

它蕴藏于人类知识的结构，是象征和建构的结果，是对现实进行客体化的不同形式。各种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人造物（物理学中的夸克、生物学中的基因、人类学中的神话、社会学中的制度），产生于复杂的形塑活动以及使之可知可见的理论和技術。对建构过程的分析严密审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各种互动，密切关注各种科学的技术性机制，如进行象征性写作、论证和形式化时所运用的方法，系统和模式的类比机制（物理学中的微观模型、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人类学中的文本、实地调查中的档案）以及有关话语和交流的修辞、论辩机制。（Borutti, 1988）

客体化过程中主体的作用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都普遍存在。前面提到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制造并不断地改变着系统状况。如果科学来自于这种主客互动，那么实验和实地调查就是对客体的建构活动。这种建构决定于主体的在场，科学实验由此成为制造各类客体的理想环境，它用数学和象征来呈现研究对象。而人类学中的问卷、访谈以及对场景和人际关系的控制，都是交流互动时建构社会事实的工具。田野不再是生产“事实”（truth）的实验室，它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贮藏“事实”的容器，无法独立于民族志调查者以及调查者与被调查的关系。相反，它是意义建构的象征场，是通过语言和时间来生产意义的人为经历，它依赖于人类学家与被调查者主体间的、对话的实践性互动。（Malighetti, 2014a）

人类学对阐释学的吸收，使它可以用一种非方法论的方式克服关于客观性的实证主义形而上学，它不试图寻找更真实地反映现实的方法，也不把事实（truth）视为“已在”（givenness），而是在本体论层面探讨理解，从而揭示了具有语言时间性的主体与事件理解之间的本体论关系。阐释学将理解置于存在（being - in - the - world）的本体论结构中，视之为受语言（提供对世界的最初感觉）和主体的历史性所调整的前理解（pre - comprehension）（Heidegger, 1927; Gadamer 1965）。知识由此摆脱了方法上的先验论，人们开始用协商论来理解主客关系，它植根于主客之间的互属关系以及视域的融合（Gadamer, 1965）。独白式话语被前理解（通过意义预设）与理解之间的对话和历史性关系所取代，它不再追逐“知识作为自然之镜”的实证主义理想，转而强调客体与知识条件的循环关系。实证

